



# 自我 一个多重的角色

——读《何为自我》

陈连清/文

日本新生代著名小说家平野启一郎出生于1975年，23岁时凭借小说《日蚀》一举成名。他善用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而又更在乎人类精神层面的挖掘，其作品体现了他精湛的思想。读者为了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纷纷要求他提供如何更好把握作品的精髓的钥匙，为此他写下了《何为自我》这本书。此书2012年在日本出版，2019年被译成汉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对“个人”的存在状况进行的分析研究。人，作为一个个体，可不可以再分？从生物学角度，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是头、手、足、身了，就是解剖了。但从心理学、社会学和逻辑学的角度看，还是可以再分的。平野先生从英语词汇individual（不可分）中得到启发，去掉前缀in，就是dividual（可分）了。于是他对自己创作的小说进行梳理总结，对原以为最小单位的个人进行再分，提出了“分人理论”。

所谓分人，是每一个人在对他者的关系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自己，也就是人们在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时，展示出不同的自我方面。每个人都是众多分人的集合体。一个分人就是一张面孔，代表着某一角色。比如某人在单位里是领导或员工，在家里是父母或子女，在学校里是老师或学生，等等。这种不同的角色就是一个个不同的分人。

平野先生依据分人视角，创作了许多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小说，塑造了许多具有多面人格的典型，如《曙光号》《决环》《最后的变身》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这些作品与美国凯斯的小说《24个比利》不谋而合。比利的人格多达24个，这些分人集于一体，轮番占据他的身体，有时是个施虐者，有时是个守护者，有时是个骗子，有时是个工作狂。1977年，他在美国俄亥俄州连续施暴，被警方逮捕，之后又被无罪释放。

一个人面对不同的他者，会呈现出不同的自我，一人多面，甚至一人千面。这是不是面对他人戴上假面具？

平野先生说了他在巴黎读书时的经历：开始阶段，老师将他分到高级班，由于法语基础不好，很快掉队了，不苟言笑，成了“消沉内向的角色”。后来，他被调到了低级班，法语交流顺畅，如鱼得水，豁然变成了活泼外向的人。在同学们的眼中，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自己；在两个班里，都是自然的流露，没有假装和欺骗。

有人固执地认为，在许多面孔中，总有一个是自己的个性，是真正的自己。平野认为，这许多方面的自己，有的甚至完全相反，都是真实的自己。如果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人们在做表面文章，都在做鬼戏，这不是整个世界都浸泡在虚妄中？

有人又认为，在众多分人中，总有一个是起支配作用的，其他的分人是被管理的。也不是这样的。每个分人都是在与某个对象交往中相对的产物，都是独立的，没有管辖的关系。这就像区块链的网络，终端之间是直接进行，是去中心化的格局。分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去中心化的。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往往认为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有其无数个侧面。《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精明强干，刘姥姥初人大观园，还给她二十两银子，这可足够刘姥姥一家生活一年。但她唆人将贾瑞诱入厢房，浇得贾瑞一身臭粪，致使其得病致死。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多面人格。

一个人的诸多分人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与特定的交往对象反复交流和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我们面对的他者，都有着特定的身份、不同的喜好和诉求。我们在与他人交流时，自然会在自己和他人的个性中寻找调和，会采取适合对方的语言、姿态、情绪和行为，使对方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殿堂里“对号入座”。针对不同的对象，祭出不同的言行举止模式，就形成了一个分人。

《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贤士颜阖到魏国担任太子的老师。太子骄横任性，很难伺候。颜去请教高人蘧伯玉。高人云：“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之为无崖。”总之，形就而心和，顺而化之，随方就圆。人们身上的分人，面对社会对象随迁随变也是这个道理。

人们面对不同对象，会轮番进行自行匹配，迎合不同对象的“胃口”。深层的目的是，将自己变得可以广泛接受，以便更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一个人身上的各个分人都有其性质和状态，各种性状的分人又都可以相互转化。影响分人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遗传因素，有环境因素，有自励因素。而作者着重对社会与分人发展的关联作了深入透彻、鞭辟入里的剖析。

人们在与他者交往时，都以各自的分人面对。各自的分人都是独立的，但当分人们打在一起时，会互诉衷肠，相互感知，相互影响，相互调整，会相互思索对方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将对方不同于自己的因素吸收过来，内化于自身，变得越来越像“他”，从而改变自己的个性人格。

以前，一个初中同学表现良好，后来逐渐变坏，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一天天烂下去”。他与更加不堪的人厮混在一起，沾染了不良习气。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迎合他们需要的分人不断膨胀，他的变坏，对方也负一半的责任。相反，与积极的人打交道，会变得越来越好，对方也功不可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对我们还有许多启发。人生的道路起伏跌宕，坎坷不平，当我们遭遇困难和挫折时，要知道这是面对某个他者的分人在承压，只要坚韧不拔，顽强拼搏，“风雨过后是彩虹”。一个不行了，我们身上还有无数个分人！我们在顺境时，也要清楚，现在的积极乐观顺畅是这方面的分人在起作用，我们要巩固它，扩大它，乘胜前进。还要注意，我们身上还藏着许多消极的分人，只是条件没有，一俟条件合适，它就会粉墨登场，危害前程。因此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 沧海桑田 换了人间

——读《中国农民城》

胡胜盼/文

2019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圈阅，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龙港市。同年9月25日，“龙港市”正式挂牌，成为全国第一个新型“镇改市”。龙港市不设乡镇和街道的行政管理范例，开我国治理体系先河，建立起“全域城市化、农村社区化、就地市民化、服务均等化”的新体制机制。作为一个在20年前就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城市，龙港为中国城市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浙江路径与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实践样板。朱晓军所著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讲述的便是小渔村发展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真实历史，以及一群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的基层农民。

龙港市地处浙江省温州市南部，位于鳌江入海口南岸。龙港别名方岩下，旧有凄然民谣曰：“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1983年10月设镇时，龙港仅有5个小渔村、一片滩涂。数千户饿过肚子、讨过饭的农民怀着“城市梦”聚集龙港，创造了震惊全国的“龙港速度”。从拔地而起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到“产业城”，再到新生“城市”，龙港在短短35年间完成了多次历史性的跨越，因此扬名天下。《中国农民城》生动记述了从建镇开始寻找出路、发动农民进城、落实户口，到遭遇瓶颈、寻求突破、实现持续发展的全过程。朱晓军从不同角度讲述、探索着龙港何以由渔村发展为城市，龙港人何以从吃不饱、穿不暖到成为骄傲自豪的龙港市民的秘密。作者交叉互证，采访了数百位龙港人的昨天和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城市变迁记忆和农民转市民进程中的心灵史。

《中国农民城》是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创业史。一是为龙港写史，二是为时代画像，三是为人民抒怀，更重要的是为奋斗和创造作证。这是《中国农

民城》最可称道之处。作者朱晓军是当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他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写作一直备受瞩目。《中国农民城》着眼大时代、大主题，聚焦小人物、小村庄，真实书写了改革之艰、变化之巨、百姓之福，读后令人百感交集。作品的温度是通过人物的性格、心路历程表现出来的。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在用生命和梦想书写着传奇。龙港人早年间将万元户称为“猴子”，每个“猴子”都有自己艰辛的奋斗史，每个人的致富路都记录了被梦想照耀下的力拼苦搏：从小纺纱绣花的陈智慧，深山割胶的陈瑞星，盖七层楼的杨恩柱，还有陈长许、杨晓霞、王均瑶等龙港人，每个人的过往都精彩非凡，每个人的富裕之路和观念变革，都成为新时期农民实现中国梦的真实写照。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中国农民城》在写历史的过程中把人写活了，这是文学表达的特点，也是朱晓军写作的最大特点。朱晓军不仅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改革精神，也记录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农民城》是一部具有非虚构史诗品格的优秀作品，反映出了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精神和卓越的写作能力。报告文学一方面是报告，另一方面就是文学。扎实的功底、细腻真挚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朱晓军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自己对文字高超的驾驭能力，他几乎是用一个小说家的思维，用散文的语调来写一部非虚构报告文学式作品。比如一开始提到深圳发展，他写道：“这时，距深圳千里之外的龙港还是一片滩涂，五片渔村犹如散落在青龙江边的几枚卵石，水边的芦苇继续摇曳着几个世纪的荒凉。”“它的建设速度跟深圳相反，犹如从青龙江爬到岸上晒太阳的乌龟，爬爬停停，停停爬爬，说不上爬在哪儿就不动弹了，照这架势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建成。”如此带有浓烈文学辨识度的文字，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朱晓军以千钧笔力，刻画出新时期一群农民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沧桑巨变以及满满的获得感与自豪感。他将深刻的历史洞见、娴熟的文学表达和深厚的民本情怀，融汇于一个个柔慧坚韧、生动鲜活的龙港农民形象中，为中国精神、中国发展的奥秘解码，以故事和人物轨迹的方式展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之路，精彩呈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主动精神与人民创造的恢宏史诗。

《中国农民城》是一部书写在浙江大地上推进改革开放、创业创新伟大实践的精品力作，是一部浙江当代农民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浙江改革开放史，更是一部浙江精神发展史。浙江的龙港传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经典样本，它以典型个案反映了中国人民大气磅礴的创造伟力，揭示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砥砺奋进的自强开拓精神。《中国农民城》也因此具备了抢救历史、填补空白、介绍经验的史志价值和现实价值。

# 中国桥梁之美跃然纸上

——读《桥上桥下的中国》

甘武进/文

俗语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见对于人们的交通而言，在自然界中的主要障碍便是山与河，而建筑桥梁，无疑是突破河流天堑最主要且最有效的手段。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巧夺天工的大小桥梁星罗棋布，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那么，桥是如何起源、发展进而达到顶峰的呢？它们与古代曼妙无比的诗文都有怎样的关系？……要解答这些问题，翻开《桥上桥下的中国》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作者李晓杰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此书从桥梁起源和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发展与演变讲起，从古今史话、营造之术、建构之妙、诗中赏桥、佳话典故、神仙传说等九个方面，让中国桥梁之美跃然纸上。书中说，我们现在中国境内看到的最早的桥梁形态，应该是在距今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陕西西安半坡村。因其建筑物的周围挖有深、宽各五六米的大围沟，他们出行必然就会有简易桥梁。而到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诸

如梁桥、浮桥、索桥等多种形式的桥梁都逐渐出现了。

隋唐两宋时期，是我们古代桥梁的全盛时期。石拱桥的建造技术，在隋代可谓登峰造极。最为著名的有两座桥梁：一座是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的小商桥，是一座单孔敞肩圆拱石拱桥；另一座便是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竣工于炀帝大业二年（606）的河北赵州安济桥。赵州桥的桥跨桥式处世界之最，达一千二百余年之久。可以说，这是高度科学性完美艺术性相结合的古桥梁的典范杰作，设计与建造这座桥梁的工匠李春等人也因此青史留名，永载史册。

材质各异、各型各式的桥梁，遍布各地。它们美轮美奂，点缀着青山绿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从而留下了许多与桥梁有关的优秀作品，生动传神地描绘桥梁本身的雄伟壮丽，让我们能清晰了解这些桥梁所记录的历史记忆和它们过去的光辉岁月。古时的西安灞桥，与雪紧密相连。范成大诗：“为问灞桥风雪里，何如田舍火炉头。”后来，千古离别，灞桥风雪——以桥抒

情。陆游诗云：“灞桥烟柳知何限，谁念行人寄一枝。”我国古代因诗扬名的桥梁，当数苏州枫桥，因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而扬名天下。

桥梁在化天堑为通途，给予人们跋山涉水便利的同时，也和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典故结合在一起，构成许许多多动人的历史故事。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生活的地方——成都，有一座桥与他有关，那就是驷马桥，其原名“升仙桥”。司马相如凭借同乡引荐，被汉武帝赏识，在应诏前往长安之时，在升仙桥上留下“大丈夫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的立志题词。后来，他又经过该桥凯旋，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实现了当初自己题诗的志向。到了北宋时，成都知府京镗重修此桥，改桥名为驷马桥。

书中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在桥梁方面的技术成果和悠久文化，对桥梁的形制、结构、功能、审美、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特色等作了深入浅出讲解，无论是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技术，还是对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来说，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读物。